

中国抗日战争与日本对德关系的演变

· 胡德坤 ·

众所周知，在二次大战中，日本和德国是盟国，是法西斯轴心集团中的两个主要国家。但日本的实力不如德国，难以在远东单独与反法西斯盟国抗衡，它力图借助德国的力量来达到称霸亚洲、太平洋地区的目的。因此，日本在战争期间对外政策的基石是与德国结盟，以便互相配合，采取协调行动。然而，在整个战争期间，日德两国却始终各自为我，各行其是。其重要原因之一是，由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牵制，使日本不能自由行动，导致日本对德关系经常处于被动、消极状态。换言之，中国的抗日战争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，使日本深陷于持久战的泥潭不能自拔，无法跟上德国的战争步伐。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与德国的配合，加快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步伐。加速了法西斯集团的崩溃。

1937年，日本法西斯挑起七七事变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，到1938年，相继攻占中国华北、华中和华南的大片领土。日本的战争行径，不只是一定要灭亡中国，而且是它实施北进进攻苏联、南进进攻美英的世界战略，夺取亚太地区霸权的重要步骤。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：“日本地主资产阶级的野心是很大的，为了南攻南洋群岛，北攻西伯利亚起见，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，先打中国。”“日本打了中国之后，如果中国的抗战还没有给日本以致命的打击，日本还有足够力量的话，它一定还要打南洋或西伯利亚，甚或两处都打。欧洲战争一起来，它就会干这一手。”^①为

^① 《毛泽东选集》合订本，第477页。

了把中国变成它实施北进、南进战略的基地，日本在中日全面战争初期，采取速战速决方针，妄图在短时间内一举灭亡中国。但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，打破了日本速决战方针，迫使日本渐次增兵，将陆军主力相继投入了中国战场。到1938年10月，日本投入中国战场的陆军兵力达32个师团（含关东军8个师团），占陆军总数的94%，国内只剩下1个师团，可以说是倾巢而出。此后，中国战场转入战略相持，中日战争长期化的局面形成。日本终于陷入持久战的困境，欲进不能，欲退不得。这种局面使日本当局焦虑不安。因为只要存在中国抗日战场，日本无论是北进还是南进，都会出现两线作战。于是，中国抗战便成为日本实施世界战略的最大后顾之忧，解决中国问题也就成了日本国策的中心。

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，遭到了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对，它在国际上更加孤立。日本政府敏锐地感到，苏联和英美等国家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，是中国能坚持抗战的重要原因。为此，要利用外交手段改善国际地位，促进中国问题的解决。日本企图通过日德结盟，在欧亚两洲威胁牵制苏美英等国，迫使苏美英减少或断绝对中国的援助和支持，达到孤立中国，使中国屈服的目的。同时，由于苏联在道义和物质上对中国援助最多，因而，日本将外交重点放在遏制苏联方面。出于以上考虑，中日全面战争初期，日本外交的基本目标是：与德国建立以苏联为对象的同盟关系。于是，日本便展开了积极的对德外交。

中日全面战争之初，德国是支持中国的，这使日本感到难堪。1938年初，德国开始在欧洲扩张，矛头直指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，它担心引起英国干预，需要日本在远东牵制英国，于是转而采取敌视中国、支持日本的态度，这就为日本谋求与德国结盟准备了前提。1938年6月16日，在日本内阁五相会议上，陆相板垣征四郎根据首相近卫文麿的考虑，在《中国事变指导的说明》中指出，必须确认以解决中国事变为根本方针，应该以积极作战解决中国问题。如果这场战争长期化，日本就必然要同苏、英对

抗，而要同苏、英对抗，就必须加强日德意轴心同盟。^①7月3日，板垣在《陆军对时局外交的希望》中再次强调，强化日德意反共轴心，使苏联不能积极参加中国事变，使英国放弃援华政策，使美国至少维持中立态度，以便迅速而容易地解决中国事变。^②7月19日，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决定，迅速强化同德意的关系，建立对苏军事同盟，“以有利于迅速解决中国事变”。^③8月26日，日本内阁五相会议通过了《强化日德意防共协定案》，决定尽快与德国协商。对日本的提议，德国不感兴趣。这是由于德国继吞并奥地利之后，正图谋吞并捷克，极希望日本在远东牵制英国，因此，不同意缔结只限于以苏联为对象的同盟，而要求将同盟的对象扩大到英法两国。这使日本当局十分为难，这时，日军深陷于中国战场，无法同时展开北进、南进的战略。它力图将北进放在第一位，将主要矛头指向苏联，以此缓和与同持反共立场的英美等国的关系，有利于中国问题的解决。但陆军鉴于中日战争长期化的形势，强烈要求向德国让步，尽快与德国结盟，以改善日军在中国战场的被动处境。在陆军推动下，1939年1月19日，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决定向德国进行有限的让步：同盟以苏联为主要对象，根据情况也以第三国为对象；以苏联为对象时，日本进行武力援助，以第三国为对象时，则根据情况而定。^④对这一方案，德国仍不满意。此时，德国已通过慕尼黑协定吞并了捷克苏台德区，准备进一步向英法施加压力，全面肢解捷克。因此，它不体谅日本在中国战场的困境，坚持要订立包括

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：《战史丛书·大本营陆军部1》，朝云新闻社，东京1974年版，第549页。

② 鹿岛和平研究所，《日本外交史21·日德意同盟、日苏中立条约》，鹿岛研究出版会，东京1974年版，第119页。

③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：《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5·三国同盟、日苏中立条约》，朝日新闻社，东京1963年版，第67页。

④ 日本外务省：《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》下册，《文书》，原书房，东京1978年版，第408页。

以英法为对象的同盟。3月15日，德国肢解了捷克，又将矛头指向了波兰。德国的得寸进尺，激化了同英法的矛盾。于是，德国要求迅速与日本结盟，共同对付英法，但日本却无法满足德国的要求。3月24日，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在给驻德大使的电报中指出：日本准备先解决中国问题，进而解决对苏问题，然后积蓄力量对付英法。在中国事变还在进行时，如果同英美关系恶化，会给日本经济带来混乱，这将对解决中国问题影响甚大。因此，应将日本的处境告诉德国，取得对方的谅解。^①然而，德国没有耐心与日本讨价还价，5月7日，与意大利缔结了友好同盟条约，即“钢铁同盟”。

德国的行动对日本是一个重大冲击。日本从本国利益出发，希望外交上能“以我为主”，但由于它实力不足，又受到中国战场的牵制，难以自由行动，不得不向德国靠拢，虽然这种靠拢是缓慢的。德国撇开日本与意大利结盟的行动，引发了日本当局内部的一场大论争。海军从本身力量出发，认为不宜过早同英美对抗，因而坚决反对订立以英法为对象的同盟，以免卷入欧洲战争。^②陆军急欲从中国战场脱身，因而主张按照德国要求尽快结盟。陆军认为，与德国结盟对处理中国事变极为有利。5月7日，陆相板垣在内阁五相会议上强调指出，目前，日本最重要的国策是处理中国事变，其困难在于苏英对中国的支持。如果与德意结盟，则可将苏英牵制在欧洲，方能有利于中国事变的解决。^③5月9日，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在给天皇的上奏中指出，与德意结盟是极为重要的：一是从未来战争来看，可利用德国牵制苏联，利用意大利牵制英国，有利于日本北进攻苏和南进攻英；二是从解决中国问题来看，利用三国同盟可迫使苏英改变对华支持政

① 《现代史资料10·日中战争3》，美铃书房，东京1973年版，第236—237页。

② 《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5·三国同盟、日苏中立条约》，第123页。

③ 《现代史资料10·日中战争3》，第270—271页。

策，而德意又可同日本采取一致行动对付中国。在世界大战未全面爆发时，利用三国同盟牵制苏英，使中国问题易于解决，当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，又能利用同盟对付苏英。^① 尽管陆军积极推动，但内阁中多数人不愿冒险。6月5日，日本内阁会议未采纳陆军意见，但又向德国作了让步：在德意同苏联战争时，日本予以武力援助；当德意同英法战争时，日本则以无形的威胁牵制苏联参战。对这一方案，德国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。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指出，日本出于解决中国问题而重视苏联，但妨碍处理中国问题的还有英国，当德国同英国发生战争时，是日本在远东打击英国的绝好机会。^② 他以此诱导日本按照德国的要求结盟。可是，日本深感中国战场牵制之苦，在未摆脱中国战场的形势下，过早地同英国对抗，无论如何也下不了决心。在此期间，陆军还利用诺门坎事件来推动日德结盟。陆相板垣企图利用日苏间的局部冲突，将事态导向促进日本与德意结盟。7月20日，日本大本营在《诺门坎事件处理要纲》中指出，要利用这一事件迅速解决三国同盟问题。^③ 但日本百万大军投入了中国战场，关东军无法集中优势兵力对苏作战，招致惨败。8月23日，德国在入侵波兰前夕，突然同苏联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，推翻了日本对德外交前提——缔结以苏联为对象的军事同盟。这对日本当局来说无异是晴天霹雳。8月25日，日本政府下令停止与德国结盟的交涉，宣告了这一时期日本对德外交的失败。

从这一时期日本对德外交我们可以看出，中国抗日战场是日本实施其世界战略的最大后顾之忧，日本企图与德国结盟，借助德国的力量争取结束中日战争的有利国际条件，也因中国的牵制不能与德国保持一致步调而告失败。

① 《战史丛书8·大本营陆军部1》，第589—592页。

② 《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5·三国同盟、日苏中立条约》，第130—131页。

③ 《现代史资料10·日中战争3》，第121页。

1939年9月1日，德国闪击波兰，英法对德宣战，二次大战全面爆发，引起世界形势剧变：世界大国的注意力均转向欧洲，英法与德国对峙，无暇顾及远东，为日本南进提供了良机。但日本陆军主力被牵制在中国，海军尚未做好南进准备，只好眼睁睁地坐失良机。面对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，日本阿部信行内阁束手无策，于9月4日宣布：“帝国不介入欧洲战争，全力为解决中国事变而迈进。”9月13日，阿部内阁在基本政纲中又规定：“将政策的核心放在处理中国事变方面。”^① 尽管日本国策的重点在中国，但谁也提不出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。日本陆军深知，结束中日战争只有两条路：或是以大规模攻势占领重庆、成都，或是从中国撤军。走前一条路“缺乏余力”，走后一条路又为内外形势所不允许。^② 既然日本不能以本身的力量解决中国问题，便只能借助外交手段来创造解决中国问题的国际条件了。10月4日，日本外相野村吉三郎制定了《欧洲战争形势下的对外政策》，决定：“帝国对欧洲战争维持中立态度，利用国际形势，按照既定方针，为处理中国事变而迈进。”为此，对英美采取协调方针，对德国保持友好关系。^③ 这显然是冷落德国。对此，陆军大为不满，阿部内阁组阁仅4个月便被米内光政内阁所取代。面对中日持久战争，米内内阁也回天乏术。此时，欧洲战争进入“奇怪战争”时期，不战不和的战局，使米内内阁一筹莫展，无法开展对德外交，日德关系处于停滞状态。

1940年五六月，德国闪击西欧，击败英法军队，迫使法国投降。欧洲战局的突变，对日本政局产生了巨大影响。德国在短时

①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：《太平洋战争史3·日中战争2》，青木书店，东京1972年版，第283页。

② 《战史丛书90·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》，第47页。

③ 《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5·三国同盟、日苏中立条约》，第163页。

间内取得的戏剧性胜利，大大提高了它在日本的影响力，使日本感到只有依靠德国，才能达到称霸亚太地区的目的；同时，英法的惨败，使它无力控制东南亚地区，为日本南进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。于是，德国的胜利，使日本与德国结盟的欲火重新燃起，而英法的失败，又促使日本掀起了南进的狂热，它推动着日本的世界战略迅速向南进倾斜。在日本历史的这一重大转折关头，米内内阁下台，7月22日，近卫文麿再次组阁。当天，日本大本营、政府联席会议制订了《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要纲》，其方针是：“帝国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，改善内外形势，促进中国事变的迅速解决。同时，捕捉良机，解决南方问题。”^①这就正式将南进战略提上了日程。为了实施南进战略，该文件规定：对外政策的重点是迅速强化同德意的关系，以加强日本同英美对抗的地位；谋求对苏关系的迅速调整，以消除南进的后顾之忧。此后，日本便开始了向南进体制的转变。

日本在向南进战略的转变中，最棘手的仍是中国问题。虽然《要纲》把解决中国问题同南进准备放在平行地位，但前者仍是重点。日本大本营在解释《要纲》时指出，在目前态势下，从政略和战略来看，重点是指向正在进行中的中国事变。这是由于中国依赖第三国的支持，轻视日本，继续抗战。为此，日本将集中施加政略、战略压力，对援华国家采取断然态度，以迅速解决中国事变。^②要阻止其它国家援华，就需要借助德国的力量。因此，近卫内阁一成立，便迅速制订对德政策，频频向德国暗送秋波。7月30日，外相松冈洋右主持制定了《关于强化日德意合作的文件》，强调日本对德意结盟的重要性，认为日本正在进行中日战争，德意正在进行欧洲战争，双方都需要互相支援，有着相同的利害关系。与德意结盟的主要内容是：（一）划分势力范围，德意承认日本在东亚及西南太平洋地区的统治权，支持日本在这些地区建立“新秩序”。（二）订立以英国为主要敌国的军

①② 《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别卷·资料编》，第322、324页。

事同盟，双方互相支援，日本对英发动武力的时间，由日本根据情况自主地决定。（三）德意协助日本解决中国事变、对苏联关系调整，在对美发生战争时，双方就所采取的措施进行协商。^①根据这一方针，日本通过德国驻日大使奥特和日本驻德大使来栖三郎，向德国试探。此时，德国继降伏法国之后，正威逼英伦三岛，向英国施加强大政略、战略压力，企图不战而使英国屈服，因此，不愿在此时与日本结盟，以免刺激英国，从而对日本的试探反应冷淡。德国外交国务秘书魏茨泽克和德国驻日大使奥特，对日方提出的日德结盟的愿望，不予理睬。^②但英国顶住了德国的压力，同时，美国支持英国，参加对德作战的倾向愈来愈明显。这种形势使德国感到迫切需要日本在远东牵制英美。于是，德国对日本要求结盟的态度也变得积极起来。8月23日，德国通知日本，准备派遣特使斯塔玛访日，商讨结盟问题。德国主动上门，使日本欣喜不已。9月6日，日本内阁四相会议制订了《关于军事同盟交涉的方针案》，会议认为，由于日德的接近，导致日美关系恶化，便决定在同盟敌对国中增加了美国。^③外相松冈表示，争取在一二周内解决好这个问题。^④

9月9日，松冈同德国特使斯塔玛举行会谈。由于双方都有着强烈的结盟欲望，会谈进展很快。在谈判中，德国极力怂恿日本用一切手段牵制美国，阻止美国参战，要求“当三国中的一国受到未参与现在欧洲战争或日中战争的一国攻击时，三国以一切政治的、经济的及军事的方法相互援助”。^⑤这就意味着当德美开战时，日本有自动参战义务。对此，日本深以为虑。日本虽同意以美国为同盟的敌对国，但不愿被德国牵着鼻子走。尤其是海军，既未做好对美作战准备，又无对美作战取胜把握，因而，极力主

① 《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别卷·资料编》，第329—332页。

② 《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5·三国同盟、日苏中立条约》，第188—189页。

③ 《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别卷·资料编》，第330页。

④⑤ 《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5·三国同盟、日苏中立条约》，第199、202页。

张日本不能自动参战，应由日本自主决定。^①但如果提出这种条件，德国肯定不能接受。于是，日本当局内部又进行紧急磋商。

与海军相反，日本陆军和内阁持积极态度。其所以如此，是因为陆军和内阁被中国战场拖得精疲力竭，深感在短时期内从中国脱身是没有希望了，他们对结束中日战争感到绝望了，便把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南进，即通过南进打败美英，再利用南进的胜利使中国屈服。曾任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田中新一，在《突入大战的真相》一书中，披露了日本当局的苦衷：“近卫也好，松冈也好，对中国事变灰心了，对现在的政策失望了。他们说，中国事变照这样下去，已经没有希望解决了，应插足南方……。”“从窘境来看，想孤立地解决中国事变几乎没有希望了，中国事变的解决，只有作为欧亚国际大变化的一环，才有希望。”^②由此可见，日本陆军和内阁都认为，日本已不能征服中国，只有扩大欧亚战争，打败美英，才能促进中国问题的解决。出于这种考虑，陆军和内阁都急于同德意结盟，使海军处于少数。9月14日，在日本大本营、政府联席会议上，外相松冈强烈要求按德方意见订立三国同盟，他指出，现在日本已不可能站在美英一边，如果按照美国的主张解决中国问题，日本就不能实现建设“东亚新秩序”的目标，况且，就是蒋介石不抗日，中国的抗日也会更加激烈。所以，日本只剩下同德意合作一条路。^③松冈的发言代表了陆军和内阁的意见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海军也只好赞成。9月19日，日本御前会议对三国同盟方案进行最后的审议，仍有一些人忧心忡忡。军令部总长伏见宫担心由此会引起日美战争，而日本已因中国事变国力消耗，怎能对付美国呢？枢密院议长原嘉道也指出，如果签订三国同盟条约，美国会对日本进一步施加压

① 《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5·三国同盟、日苏中立条约》，第204—205页。

② 岩波讲座，《日本历史21·现代4》，岩波书店，东京1963年版，第163页。

③ 《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5·三国同盟、日苏中立条约》，第205页。

力，竭力援助中国，进一步妨碍日本对华战争。^①尽管有这些担心，但日本要称霸亚太地区，也只能依赖德国。所以，原嘉道无可奈何地说到，鉴于目前中国事变的进行和国际形势的变化，不得已而与德意结盟。^②会议最后通过了三国同盟条约。9月27日，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字，三国军事同盟正式成立。

日本与德国结盟走走停停，时快时慢，重要的一点是受到中国抗日战场的制约。日德结盟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解决中国问题的需要，即是说，为了解决中国问题，日本仓促与德国结盟，被迫过早地走上与美国抗衡之路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已注定了它在太平洋战场的失败。

三

在帝国主义外交史上，每个国家都是把本国的利益置于盟国利益之上的。盟约是形势发展的产物，是盟国相互需要的结果。日本与德国的结盟也是如此。三国同盟建立后，日德两国都借助盟约来增加对敌国的威压，但在政略、战略上却仍是以各自的构想为轴心。日本充分利用三国同盟，来实现南进的战略转换。

利用三国同盟改善对苏关系，是日本外交的重要一环。日本与苏联改善关系的目的，一是为了解除南进的后顾之忧，二是为了阻止苏联援华，以有利于中国问题的解决。10月3日，日本外务省制订了《日苏国交调整要纲》，希望与苏联缔结类似德苏条约的互不侵犯条约，主要内容是：使苏联协助日德意三国建设“世界新秩序”，并加入三国同盟，承认中国和东南亚为日本势力范围，把外蒙、新疆、中近东划为苏联势力范围，苏联承认“满洲国”，改变援华政策，抑制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活动等。^③松冈把《要纲》精神通知了驻苏大使建川美次，建川立即会见苏联外交人民委员，提出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，但没有得到

^{①②} 《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别卷·资料编》，第340、341页。

^③ 《日本外交史21·日德意同盟、日苏中立条约》，第269—270页。

答复。松冈又指令驻德大使来栖三郎，要他向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提出：德国协助日本改善对苏关系，德苏共同或分别劝告蒋介石政府同日本实现和平，如果日苏关系得到改善，中国事变得到解决，日本将协助德国打倒英国。^①里宾特洛甫表示，愿意劝告苏联与三国同盟保持一致。11月10日，莫洛托夫访问柏林，里宾特洛甫向他提出，希望日苏两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，德国愿意从中斡旋。莫洛托夫表示，愿意同日本改善关系，但不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。^②11月18日，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召见日本大使建川，提出订立中立条约的方案，松冈大为不满，使日苏交涉陷入停顿。12月，在德国与英国久峙不下的情况下，希特勒决定挥戈东向，进攻苏联。德国便背着日本悄悄地准备侵苏战争，显然不愿意日苏关系密切，但又不能阻止日苏接近。松冈不知德国意图，决定于1941年春访欧，改善对苏关系。

1941年2月3日，日本大本营、政府联席会议审议《对德意苏交涉要纲》，总方针是利用德意牵制苏联，使苏联同意三国关于势力范围的划分，服从三国同盟的宗旨。在中国问题上，要求苏联放弃援华，要求德意帮助日本进行南进军事准备，包括缩小在华战线等。会议认为，日本要南进，就需要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，就必须缩短在华战线。参谋总长杉山元坚决反对这一意见，他认为，缩短在华战线，中国事变就不可能解决。首相近卫支持杉山。会议最后否定了这段条文，改为希望德国促进日本同中国的和平。^③根据这一文件，3月26日，松冈到达柏林，向德方寻求其对订立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支持，德方断然予以拒绝。松冈坚持说，他打算回国途经莫斯科时，与苏联缔结友好条约或中立条约，里宾特洛甫告诫说，最好不要这样做。^④但这没有引起松冈的注意。4月7日，松冈到达莫斯科，13日，同苏联缔结了中立条约。

① 《日本外史21·日德意同盟、日苏中立条约》，第271页。

②③④ 《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5·三国同盟、日苏中立条约》，第274页、364页、289—291页。

日苏中立条约签订仅2个多月，1941年6月，德国突然袭击苏联，给日本的南进战略以巨大的冲击。为在短时间内征服苏联，德国极力劝诱日本北进。6月30日，德国告诉日本：德国的进攻将使苏联在短时间内崩溃，其结果将促进战胜英国，这对日本攻苏是难得的好机会。日本在未做好南进准备之前，应该先参加解决苏联问题，以保证南进时背后的安全。日本应毫不踌躇地对苏作战。^①面对北进良机，是北进，还是南进？日本当局内部争吵不休。刚刚同苏联签订中立条约的外相松冈，却力主北进。在6月27日的大本营、政府联席会议上，松冈提出“道义外交”论，认为日本应遵循三国同盟条约，配合德国，先打苏联。松冈深知，影响日本北进的要害是中国问题，由此，他提出，如果日本北进，就会影响到蒋介石，也许蒋介石会同日本全面媾和。他甚至认为，即使在某种程度上停止解决中国事变也要北进。松冈的主张遭到陆军的强烈反对。陆军深知，其主力正在中国作战，没有余力北进。陆相东条英机断然拒绝松冈的提议，他指出，“中国事变必须继续解决”。参谋总长杉山元也指出：“搞道义外交当然可以，但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现在正用于中国，实际办不到。”7月2日，在日本御前会议上，杉山又进一步指出：“对德苏战争，日本当然应该根据三国同盟精神采取行动，但帝国目前正忙于处理中国事变，我觉得以暂不介入为宜。”^②会议赞同陆军的主张，认为，北进问题只有等到苏联败局已定，瓜熟蒂落，才能趁火打劫，不战而胜。因此，会议通过了《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要纲》，决定：“不管世界形势如何演变，帝国均将以建设‘大东亚共荣圈’……为方针”，“向处理中国事变的目标前进，并为确立自存自卫的基础，跨出南进的步伐”。“如果德苏战争进展对帝国有利时，则行使武力解决北方问题”。^③这就

① 《日本外交史21·日德意同盟、日苏中立条约》，第296页。

② 服部卓四郎：《大东亚战争全史》，原书房，东京1982年版，第81—84页。

③ 《现代史资料35·太平洋战争2》，美铃书房，东京1978年，第121页。

最后确定了先南后北，即南进方针。此时，德国最需要的是日本北进，而日本却反其道而行之，偏偏要南进。这就表明中国抗日战争的牵制，对三国同盟建立后日德第一次战略配合的破产起了重要作用，而且也使日本失去了北进的最后一次良机。这同时也表明，社会主义苏联在卫国战争最困难时期，得到了中国的有力支援。

1941年12月，苏联顶住了德国的闪击战，使德国焦虑万分。此时，德国急切盼望日本北进，造成苏联腹背受敌。但日本从本身的利益出发，决然南进，发动了太平洋战争。日本对德方针是：力避随其参加对苏战争，利用三国同盟先使英国屈服，根据情况让德苏议和。^①日本的南进举动，使法西斯集团兵力分散，战线延长，迫使德国对美宣战，增加了德国的负担。12月11日，日本与德意订立了军事协定，但实际上，三国已完全不能协同作战，这在客观上为反法西斯盟国对其各个击破提供了条件。我们完全可以说：由于中国坚持持久抗战，日本在南进之前，没有余力北进，南进之后，就更没有余力北进了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德国希望日本北进的愿望完全成了脱离实际的奢望。

1941年底至1942年初，苏军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，大挫了德军的锐气。希特勒恼羞成怒。于1942年6月发动斯大林格勒战役，这是关系到苏德战争胜负的关键一战。7月20日，德国紧急吁请日本对苏参战。7月25日，日本大本营、政府联席会议制订《关于答复德国的文件》，强调日本对苏坚持既定方针，防止对苏战争。为了安慰德国，文件空洞许诺日本将在印度洋配合德国作战，促使英国屈服。日本当局之所以采取这一方针，一是由于日本正同美英军队在太平洋战场作战，二是担心盟国将中国作为反攻日本的基地，故不能不对中国战场付出很大的努力。^②日本自顾不暇，当然也不能向盟友伸出援救之手。1942年底至1943年

① 《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别卷·资料编》，第585—586页。

② 《日本外交史24·大东亚战争战时外交》，第126—127页。

春，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遭到惨败，而日本亦在瓜岛战役中完全败北，两国都失去了战争主导权，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。为挽救败局，1943年初，德国又吁请日本对苏作战，日本表示无能为力。4月，德国大肆渲染将在苏德战场发动夏季攻势，劝诱日本参加对苏作战。4月28日，日本大本营、政府联席会议商讨德国的要求，考虑到本身的困难，断然拒绝参加夏季攻势。9月3日，意大利投降，三国同盟开始崩溃。9月30日，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向苏联派遣特使，通过谋求对苏关系的好转，促成德苏和平，以挽救轴心国的溃败，但遭到苏联拒绝。进入1944年后，日德两国均已四面楚歌，败局已定。为了“死中求活”，8月19日，日本御前会议制定的外交政策，虽然还承认日德特殊关系，但已明显将对苏关系提到很高地位：不仅要促进德苏和解，而且希望在德国战败后利用苏联改善日本的处境。^①对日本这一不现实的设想，不仅苏联予以拒绝，就连希特勒也不感兴趣。此后，日德两国面临反法西斯盟国的重重包围，它们的同盟关系实际已不复存在，两国均未能逃脱历史的惩罚，以失败而告终。

从上述可见，自日德结盟以来，两国还没有过一次有计划战略配合，其重要原因之一，就是由于中国抗日战场对日本的制约。

纵观二次大战期间日本对德关系演变的历史，我们不难发现：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，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，无论是强国还是弱国，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。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弱国，但中华民族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中，以自己的血汗与生命英勇奋战，不仅成为打败日本法西斯的主要力量之一，而且牵制了日本世界战略的展开，有力地支援了其它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，也直接影响到日德配合，加速了法西斯轴心集团的崩溃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。

（作者单位：武汉大学历史系）

^① 《日本外交史24·大东亚战争战时外交》，第147页。